

## 第五章 結 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有二，首先是五十餘年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發展出那些特點；其次則是這些特點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研究在第三章實際分析了 111 篇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的博碩士論文，整理的方式分別以 1949-1987，1988-1996，1997-2002 三個時間縱軸觀察研究主題、研究方法、使用理論之間的變化。根據整理的結果顯示，在大陸研究所的論文部分，研究主題以「政治宣傳與國家發展」最多（44%），其次是「兩岸互動」與「新媒介」（各 14%）；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被使用的次數最多（30.8%），內容分析法次之（21.5%）；使用理論則是以「蘇聯共產報業理論」居冠（26.8%），再來是「心戰宣傳理論」（14.6%）。

在新聞研究所的論文部分，與大陸研究所呈現相似的情況，研究主題以「政治宣傳與國家發展」佔大多數（50.8%），「兩岸互動」居次（11.4%），但兩者相差四倍多；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以「內容分析法」佔絕對多數（57.7%），其次則是文獻研究（16.9%）；至於使用理論方面以「蘇聯共產報業理論」（53.7%）為主，「心戰宣傳理論」次之（18.5%）。

大陸研究所與新聞研究所兩者相互比較，發現除了研究方法稍有差異之外，其它的部分呈現相同的情況，也就是說，五十年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傳播研究還沒有發展出更豐富的論述內涵，研究架構及觀點仍然受制於傳統喉舌論的影響。

接續第三章的研究發現，第四章描述研究者透過傳播研究所得到的「中國他者」為何。因此提出了「極權主義的中國他者」與「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他者」這兩個面向。這兩者共通的意義在於指出我們思考中國大陸傳播議題陷入了「化約主義」的窠臼；因為從本文所分析的三項類目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大陸研究所或是新聞傳播研究所，在研究主題、方法、理論的使用上都是受到了「蘇聯共產報業理論」的制約；我們若是能夠跳脫共黨喉舌論的典範影響，必然可以獲得更細膩的觀察與收穫，因為中國大陸的傳播媒體畢竟不是鐵板一塊，這是傳統理論的侷限，也是研究者所應當留意的環節。此外，本文還論述了「極權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所代表的預設立場，對於理解中國大陸現況，並不具有多大的助益。因此，本文提出在「市場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大陸傳播媒體可以發展的方向，也就是由統制經濟的媒體結構（國家擁有所有權、控制權），過渡到市場社會主義的媒體結構（國家擁有所有權，但交出經營權），調和傳播媒體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綜合以上所論，從第三章所整理出來的數據顯示出，我們的研究至今依舊受到蘇聯共產報業理論的典範影響，是以本文認為台灣的研究者在進行「中國大陸傳播研究」時，或許受到過去歷史記憶的影響，或者是長期依附於西方（美國）傳統的研究典範而不自覺，因此將使得我們的研究眼界無法與中國大陸的現實動態相互接合，這似乎是我們的研究者在進行中國大陸研究時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突破之處。

## **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建議**

###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對象的取材上，以台灣的大陸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新聞研究所的研究生論文作為分析主體，但支撐整體學科發展的研究作品，除了學位論文之外，尚有正式出版的教科書，學術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以及由政府、民間機構所補助的專案研究，因此如果要更詳細的描繪中國大陸傳播研究在台灣的發展，理所當然應該納入前述項目的研究。本文僅以博碩士學位論文作為分析論據，推論的範圍當然也就僅限於研究生的研究情況及問題意識，而無法統論台灣學界研究的整理概況。

此外，本研究僅對於台灣地區的學術作品進行分析，但卻沒有對於諸如香港、大陸、甚至是西方華人的研究進行整理，這代表本文所得出的結果由於缺乏一個比較的對象，因此也就無法對於台灣地區所整理出來的結果作一個整體性的價值評論。同時，也可能無法觀照到我們比較欠缺那些部分的研究與觀點。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代表著後續研究仍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

### **貳、後續建議**

本文在研究取材上，僅將研究範圍限定為台灣地區、及博碩士論文，因此無從比較諸如中國大陸、香港、西方華人等研究者其研究觀點及使用典範，因此如果有興趣進行後續整理者，可以挑選上述三地的研究者作品作為分析比較的對象，藉由比較研究的方式，必然能夠得到更為詳盡的推論，以及更為全面的理解。

例如可以整理出西方華人是如何論述中國大陸的傳播議題，在整理出西方世界的觀點之後，可以台灣作為比較對象，觀察戰後台灣學術界依附西方世界的慣性，是如何體現在中國大陸傳播議題的研究上。或者，研究中國大陸學界對於自身研究的觀點，而後同樣比對台灣的研究景況，如此可以發現我們在看待中國大陸的發展時，與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落差有多大，又，可以如何調整我們的研究方式，以便和研究對象的主體行動者進行對話。此外，由於東歐與中國大陸在過去的意識型態與經濟發展經驗上，都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因此比較東歐在走入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之後的媒體生態，與中國大陸的傳播媒體現狀相做比較，進而發現其中相抑或相似之處，提供成功或失敗的發展經驗，凡此種種，都有值得一書之處。

最後，在研究取材上，除了博碩士學位論文之外，出版書籍、專案研究、期刊論文等文獻都是可以進行分析的對象。以香港為例，香港學者諸如陳懷林、陳韜文等人皆陸續於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從新制度主義的角度討論中國大陸傳播媒體的制度變遷及其影響，而西方學者或華人，用比較宏觀歷史的角度論述中國大陸傳媒的生態與發展，也是值得進行比較研究的素材。